

包頭文史資料選編

第十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包頭市委員會
文 史 資 料 委 員 會 編

目 录

日寇在包头地区的侵略罪行

前言	李士荣	(1)
日伪军在包头的部署及战役简况		(3)
日本陆军在包头的特务活动		(22)
杀人魔窟——包头日本宪兵分队		(34)
包头日本领事馆		(49)
日本善邻协会包头支部		(55)
日寇在蒙绥地区和包头建立的社会团体组织		(61)
日寇的傀儡政权——包头市公署		(66)
伪包头市公署警务科		(69)
巴盟兴亚协进会包头支部		(73)
包头“西北哥老会”(洪门)情况		(76)
包头民生会(青帮)情况		(85)
包头沦陷期间的敌伪组织与日人经营的商业	王龙耿	(88)
日寇在包头布防情况	韩祥符	(94)
开辟“兴亚街”的阴谋	韩怀信	(98)
日寇在包头实行经济掠夺的情况	李士荣	(101)
发行纸币 狂夺矿藏 种植鸦片	韩怀信	(122)
伪同和实业银行包头支行始末	孙士俊 王绍青	(126)
日寇对包头皮毛的掠夺	贾 瑞	(132)
日寇在萨县的罪恶行径	刘绍仁	(136)
大量石拐煤炭被掠夺	韩怀信	(139)

- 日寇实施的思想文化侵略 李士荣 (143)
日寇在包头扶轮学校强行奴化教育 韦克非 (151)
勿忘血泪仇 郭伟哲 (158)

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新六旅在包头、绥远和五原三战役中战斗实况

- 王崇仁 (161)
记袭击日军汽车队的一次战斗 白震 (174)
马子成虎穴探险记 陈万华 (180)
绥远抗日自卫军第二路军始末 赵立斋 (190)
包头战役亲历记实 李敏才 (199)
绥远民众自卫军抗日记事 张乃钧 (204)
抗日激情溢于言表 郭汉 (215)
执行占领包头先遣队任务的回忆 刘一平 (217)
在敌后工作的日子里 郭耀宗 (223)
国民党接受包头日军投降的经过 新书升 (232)

-
- 补白 6 则：**建筑防御设施 (54) 日寇侵占白音宝格德圣山 (121) 种烟吸毒开赌场 (131) 建筑大东亚圣战纪念堂 (142) 水牢和木笼牢 (138) 施放毒气和细菌 (150)
《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九辑正误表 (240)

日寇在包头地区的侵略罪行

李士荣整理

前　　言

日本帝国主义垂涎我国大好河山由来已久，把征服中国作为其称霸世界的基础。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勃兴，富国强兵，跃居于世界列强行列，积极推行大陆政策，不断向外扩张，租割、蚕食、肢解我国领土。中日甲午之战攫夺了我国台湾和朝鲜半岛。昭和年代又提出：“满蒙是大和民族经济生活所必需的条件，是日本的生命线”。1927年，首相田中义一提出臭名昭著的“惟欲征服支那（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奏折，鲸吞和肢解我国的祸心彰明昭著。

1929年秋，爆发了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它成为日本统治集团摆脱困境，加速向我国扩张侵略的催化剂。

日本侵略者一贯运用的手法是，在政治上施展阴谋策略，怀柔、威逼、利诱、收买亲日寇国民党政要，组织傀儡政权，达到兵不血刃占领我国领土的目的。这种手法不能得逞，就寻衅滋事，制造事端，恃强武力，耀武扬威，还玩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利用我国多民族的特点，挑拨民族关系，扶植民族败类，建立什么“满洲国”、“大元帝国”、“伪蒙疆”、“华北国”以

及伪中央国民政府，企图分割统治，互不统属，彼此牵制，以利于统一驾驭的目的。

“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推行一套“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在内的总体战”。军事上用尽各种战略战术，妄图消灭我国的抗日武装力量；政治上使用各种谋略，欺骗怀柔、恩威并施，笼络收买亲日叛国分子，组织傀儡政权；思想上炮制满洲的协和思想、华北的新民思想、蒙疆的兴亚思想、察南的新仁思想，企图奴化民众，抵制共产主义和抗日救国的爱国思想的传播；经济上采取各种手段，搜刮掠夺“彻底收集华北（包括蒙疆）战略物资，尽量多运日本，支持战争”，使华北和蒙疆地区成为鲸吞中国，征服大东亚的战略基地。

日寇占领包头，把包头作为重要战略基地，看成是北防苏、蒙，南御陕北革命根据地，西侵甘、宁、青、新广阔地域的桥头堡。因此，日寇在包头建立诸多军、警、宪、特，政治、经济、思想等机关团体，还拼凑了形形色色的御用傀儡组织，大肆进行特务活动，镇压抗日救国运动，残害人民群众，罪恶滔天。

按照市政协文史部门征集资料的要求，为了比较系统地揭露日寇在蒙绥，特别在包头地区犯下的罪行，我根据大量调查材料、档案、日本侵华战史和年鉴等，作了诸多侧面核验，排比综合，加工整理，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几个方面写出此文，以管窥日寇侵华的一些阴谋手段及其罪恶行径，目的是从血海、屈辱中铭记这一血的历史教训，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增强国防观念，时刻警惕危及和平的战争狂人复活。

由于事隔半个世纪，当事人多已作古，给核实带来一定困难，难免有失真之处，恳请知情人士斧正补录，使这一史料更加翔实。

（本文作者原任包头内燃机配件厂副厂长，现已退居二线。）

日伪军在包头的部署及战役简况

侵占绥远的日军主力，主要是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以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为基干编成的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为后宫淳中将和驻守在辽宁省公主岭的酒井机械化师团，师团长为酒井中将。蒙绥战事结束之后，酒井机械化师团回防公主岭，又调来独立步兵第十三联队（联队长石黑岩太夫佐）接防。驻守在绥远的日军约7至8千人。主要龟缩在平绥铁路的集宁、归绥、包头以及沿铁路的城镇和火车站。

早已投降日寇，以德王、李守信为首的伪蒙古军，奴颜婢膝，积极配合日寇侵华战争。不仅先行占领化德，还积极配合日军向绥西腹地进犯。集中主力在平绥线上配合日军作战，并分兵攻占陶林、武川一带。由于蒙古军均为骑兵部队，行动比日军快速，日寇怕蒙古军抢先占领绥远省城归绥市，有失“皇军神威”，指令蒙古军不得孤军深入，等日军抵达后，共同占领归绥、包头。伪蒙古军在日寇侵略我国时，不仅充当马前卒，在日寇统治时期，又助纣为虐，成为御用帮凶和驯服的鹰犬。

一、驻守在包头地区的日军情况

1937年10月至1938年底

抗日战争初期，华北和西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奉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命令大撤退，大好河山拱送日寇之手。1938年初日军将东北骑兵挺进军包围在绥远固阳线黄油干子，敌人以33架飞机从空中袭击，50辆装甲车分四路向村子赶来，马占山将军抱病率部

与敌殊死血战，在激战中，骑兵师师长刘桂五壮烈牺牲。马占山突出重围，在大青山又与敌人血战八昼夜，最后在榆树背一战，击毁敌装甲车 9 辆，毙敌二百余人后，率部脱险。

驻守包头地区的日军为第二十六师团所属的吉田步兵联队，联队长为吉田（后调驻蒙军司令部骑兵监）。兵额为 2 至 3 千人，每班配备有轻机枪一挺；每小队有重机枪二挺；每中队有装甲车二辆、野炮二门；每大队附有化学兵一个小队。司令部设包头旧城（原绥西屯垦办事处，今胜利路路北），兵力分驻在包头、萨县、固阳一带。

另一支日军为大贺骑兵联队，联队长为大贺，兵额 2000 人，武器配备略同吉田联队。驻守在吉田步兵联队防御区线上。

在包头防区还有伪蒙古军第一师，师长刘继广（字润斋），后任包头市第一任市长，一师由丁其昌继任。

由于包头是枢纽重镇，戒备格外森严，城内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外设三道防线。第一道设在麻池一带；第二道设有电网、密布地雷；第三道设在包头城外，挖有深、宽各四公尺的外壕，壕外有电网、鹿寨，分别由蒙古军和第一路（司令森盖林庆）、第二路（司令包怀布）、第三路（司令三罗汉）等伪军防守。

1938 年 1 月 8 日，成立日本驻蒙兵团司令部（7 月 4 日又改编为驻蒙军司令部）司令官为莲沼蕃中将，隶属华北方面军（又称北支方面军，司令官为寺内寿一大将、参谋长为冈部直三郎少将）管辖。驻蒙军司令部设在张家口，除负责蒙疆地区治安防务外，还配合华北战场协同作战。

这一时期，国民党傅作义所属王子修、孟文仲及门炳岳部队，不断对日伪防区进行武装骚扰。我八路军和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都在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力量。1938 年 9 月 1 日，李

井泉、姚喆等同志奉党中央命令，率领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游击队（又称李支队）挺进大青山，燃起绵延抗日的烽火。

1939年初至1940年初

1939年初，华北方面军根据日本大本营的华北作战指导原则，要求把蒙疆地区在军事上、政治上形成特殊地位，并加强包头地区防务作战，更便于山地和平原作战的特点，进一步巩固包头地区的警备治安秩序，调整了日军军事部署。调原驻守在鲁南地区的第十二军（司令官为尾高）所属的骑兵集团（缺骑兵第四旅团）相当于师团规模。集团长为马口中将，后由小岛藏吉中将继任。划归驻蒙军建制，接替第二十六师团驻守在包头、萨县、固阳等区域的日军。三月中旬转防接替结束，四月份骑兵集团分兵攻占安北、西山咀一带。这一时期，兵力部署如下：

骑炮兵联队：联队长为熊川长致中佐和战车队、炮车等部队驻守包头；

骑兵第一旅团：旅团长为片桐茂少将，驻守在萨拉齐一带；

骑兵第十三联队：联队长为小原一明大佐和独立骑兵第三大队驻守固阳一带；

骑兵第十四联队：联队长为小林一男大佐和独立第四守备队驻守在安北、西山咀一带。

自日寇占领包头至1939年秋，由于我抗日武装处在创建和发动组织群众阶段，据守后套和黄河南岸的国民党傅作义、马占山的部队也未发动大规模进攻。日军滋长骄傲轻敌思想，盲目认为治安管理区治安状况好，产生轻敌思想。1939年底，傅作义将军决定变战略防御为战术进攻，出敌不意，强行奇袭，重创敌人，以长中华民族的志气。于12月20日晨，当驻守包头的骑兵集团敌酋小岛藏吉中将，送走熊川长致中佐率领的“讨伐队”之后，在返回司令部时，傅作义部队的先头部队潜入市内，在日军司令部北边

200公尺处发起激烈的巷战，并逐渐接近司令部。日寇惊慌万状。当集团军参谋用电话向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中将报告时，小岛自恃能击败我抗日之师，拒绝冈部增援。遂即将驻守萨拉齐的片桐茂旅团急调包头增援，下午四时抵包，参加战斗。

21日晨，包头仍继续进行激烈的巷战，日寇惊慌万状，驻蒙军司令不得不速派两个大队增援包头。22日，日军才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反攻，23日傅部开始撤出包头。

这次战役，不仅消灭了大量包头的日、伪军，还伏击了驻守固阳骑兵第十三联队和驻守安北的骑兵第十四联队援包之敌，重创小原一明大佐的第十三联队，日军死伤过半。还击毙第十四联队联队长小林一男大佐。

这次包头战役，歼敌数千，击毁百余辆各种车辆，缴获大批武器，狠狠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反动嚣张气焰，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激发了中国人民抗日的斗志。

包头战役之后，日酋老羞成怒，一方面以肃清内奸为名，大肆搜捕、广事株连，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董五三、王文质在包同志会案”，逮捕80余人，严刑逼供，惨杀处死的20余人，造成精神分裂、终身残废的数十人。

另一方面，不仅集中骑兵集团和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黑田重德中将）的主力，还从晋、冀、豫各战场调来第二十七师团、第三十七师团、第四十一师团、第一一〇师团、第三独立混成旅团、第十六独立混成旅团部分兵力，共计三万余日军，配属飞机12架、坦克、炮车、汽车多辆，分三路向绥西进犯。一路为骑兵集团主力和独立第二混成旅团的达村支队，于28日出发，沿黄河两岸西进，通过长牙店、分格地区，于2月3日在五原附近集结。一路以两个师团各一部，分左右追击队，分别占领临河、陕坝，于2月11日扫荡结束，向五原集结。另一路于2月2日出

发，从申公旗（今巴盟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出发，向百川堡进犯，企图切断傅部西撤的退路。

傅作义将军获悉日寇进犯后套消息之后，于1月16日，在五原召开团长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对敌之策。经分析，提出，在战略上要“避不利、找胜利”，“不失机、不吃亏”，不能让敌人捕捉到主力，还要不时阻击、伏击、袭击敌人，给敌以沉痛打击。在战术上运用“以少牵多、以多打少”，“能打则打、不能打则退”的游击消耗战，相机痛歼日寇，集小胜为大胜，消耗和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牵着敌人鼻子走，敌人想打打不上，想站站不稳，想走走不了，使敌人无法持久下去。

按照上述战略、战术原则，傅部在不同地区伏击、阻击敌人。日军孤军深入，战线太长，兵力分散，疲于奔命，首尾相顾不及，加上民众空室清野，日伪军给养发生问题，所以于2月中旬，各军陆续撤回原防区，至3月1日，又恢复到原作战前的状况。

由于傅部实行主动撤退转移，日军虽侵占五原、临河、陕坝等地，除与小股部队有所接触外，始终未和傅部主力发生过大规模战斗。

由于驻蒙军内部对后套作战的目的认识不一，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主张：后套作战目的不是占领土地，而是围歼傅军，报包头战役之仇。军参谋长田中新一少将和骑兵集团长小岛藏吉中将、第二十六师团长黑田重德中将则主张永久占领，不占领失去作战意义。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飞抵五原后，支持田中等人永久占领五原的意见。司令官冈部被迫在下列条件下，同意将蒙古军、绥西联军留驻五原。并将以下条件对留驻五原的特务机关长桑原荒一郎中佐做了指示：

（1）留置蒙古军的目的，在于搜集敌情和对回教军进行策

反工作；

- (2) 发现蒙古军有退败征兆时，应无条件撤退；
- (3) 不能指望日本军的支援；
- (4) 绝对不得借口友军的后援，进行民众工作和地方政权工作。

由于军参谋长田中对上述条件置若罔闻，阳奉阴违，背着国民政府司令官，暗调数百名蒙疆警察队和日系警务官佐，指令包头特务机关也抽调日伪人员支援五原政务建设和特务机关工作。

2月下旬，傅作义将军认为反攻五原条件成熟，决定采取速战速决战术，先集中全力歼灭五原之敌，后打增援之敌，方法用“掏心战术”和“引水阻援”。经过战前训练和军事准备工作，于3月20日夜，开始向五原新旧城及周围据点发起攻击，敌人从梦中惊醒，仓皇应战，至22日夜，全歼五原之敌。

3月21日中午，包头日军援军先头部队抵河套境内的乌拉壕畔受阻。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傅部避免重大伤亡，暂时撤退。采用“引水阻援”之计，河水淹没通向五原的公路。道路泥泞，敌军坦克、汽车受阻，强行架桥，乘橡皮艇强渡，徒步奔袭五原。26日中午冲进五原，遍寻日官兵尸体，连日火化，装入骨灰盒。由于大面积泛滥地区，行军困难，日军恐被围困，在飞机引导下，仓皇退出河套，向包头撤退。日伪军伤亡惨重，以桑原荒一郎中佐为首的特务机关人员全部被歼，日军发动的第二次河套进攻作战以失败而告终。小岛藏吉中将因战事失利被撤职。11月份为包头和五原战役战死的34名日系官兵举行了追悼亡灵大会。

1939年底至1940年3月，傅作义将军指挥所部袭击包头，余战绥西、五原歼敌，重创日寇，粉碎“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是国民党防务区的空前胜利，不仅改变了绥西地区敌我形势，

还有力配合了晋绥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游击队，给侵略蒙绥的日寇以沉重打击，大大激发了抗日热潮，为我国抗日历史谱写了光辉篇章。

五原战役以后，日寇未敢大规模侵犯后套地区，在西公旗一带派驻蒙古军和绥西联军与傅部形成隔河对峙局面。

1940年4月至1941年期间

驻蒙军司令官改为甘粕重太郎中将，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改为矢野音三郎中将，骑兵集团军集团长改为西原一策中将，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改为真野五郎少将。各部队防务区域未变。1941年12月25日，为了防御傅作义、马占山部队的冬季攻势，发动了鄂尔多斯战役，出动了骑兵集团军主力、伪蒙古军和哥老会的鄂尔多斯挺进队，渡过封冻的黄河，于月底在包头东南70公里的齐登堡附近，与国民党军队发生了战斗。

1942年期间

1942年，驻蒙军司令官改为矢野音三郎中将，第二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改为永松实一少将，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改为柴山兼四郎中将，原骑兵集团军改编为战车第三师团，师团长为西原一策中将。包头地区仍由原骑兵集团军改编的战车第三师团驻守，官兵8500人。

1月17日，再次侵袭鄂尔多斯地区，奔袭傅作义骑兵第七师驻地新民堡（距包头东南偏南70公里）一带，20日撤回原防地。

下半年，战车第三师团不断渡过黄河，向鄂尔多斯平原国民党第八战区新编三十二师驻地进犯。由于地域辽阔，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讨伐困难。

1940年至1942年期间，日军多次进入大青山一带进行扫荡，为隔断山区和平原的联系，威逼沿山的小村庄并入大村，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村庄被烧毁，树木被砍光，仅井尔沟被

烧毁房屋达300余间；没有来得及隐蔽的群众被杀光，使井尔沟成了“无人区”。在一次扫荡中，日寇烧毁了山后的一前响、万家沟到水磨沟的所有村庄。在西水滩，日寇将全村20多名群众赶到场面上，用刺刀全部捅死，一个七岁小男孩被捅十七刀，惨不忍睹。一位老大爷被捅数刀，后来竟然活下来，成了唯一的幸存者。敌人还在前脑包、大南沟、前野马兔、后野马兔、北留兔村、巴总窑子、美岱召、萨拉齐等地进行灭绝人性的血腥抢、掠、烧、杀、淫等罪恶活动。

1943年期间

5月1日，驻蒙军司令官改为七田一郎中将（后又改为上月良夫中将），第二十六师团长改为佐伯文郎中将，坦克第三师团长仍为西原一策中将，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改为松甫丰一少将。

由于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春季，日本大本营重视蒙疆地区对苏作战准备，提出确保“多伦——张家口——包头”一线的防御计划。6月份，驻蒙军司令部设置了由吉冈善四郎少将领导的“筑城部”，8月份，开始筑城教育和物资材料准备工作。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失利，筑城材料严重匮乏，进度缓慢。后将筑城改为以“阴山山脉为主要抵抗线，尽量利用地形，坚持持久作战，应以重要的航空设施为重点”。1944年3月，日军全线兵员吃紧，抽调坦克第三师团和第二十六师团增兵其它战场，驻蒙军兵员严重不足，大本营改变对苏作战计划，缩短防线，放弃厚和浩特、包头西线一侧，主要放在平地泉以东阴山山脉一带，阻击苏军。

1944年期间

日寇在中国及太平洋战场上屡吃败仗，节节失利，3月调走驻守包头地区的坦克第三师团，由第二十六师团抽派步兵独立第

十一联队担负包头地区警备。

7月，第二十六师团也奉命调往其它战场，由新编一一八师团（师团长为内银之助中将）接防，包头防区由新编一一八师团所属的第十二野战补充队接替。

日军全线吃紧，军队调动频繁，挖肉补疮，捉襟见肘。线长点多，兵力不敷分配，有的营房成了只有哨兵，内无士兵的“空城”。有时出动大批汽车，载少数日兵、余置假人，沿途奔跑，或夜间空车往返奔驰，散布增兵消息，实为“扬兵之计”，虚张声势。历次作战，日军伤亡很大，补充的新兵素质很差，战斗力大大削弱，老弱、小孩亦被征入伍，日军士兵中还有很多朝鲜、台湾、东北籍人。由于生活恶化，厌战、反战情绪日益滋长，经常发生自杀、叛逃事件。日军首脑机关在分析官兵思想动向时，不得不承认：“战场的特殊性、滋长的厌战、嫌弃、希望退伍、思念家乡等情绪”，“对于与军队有关的事件（三光政策，抢、掠、烧、杀、淫的血腥行为）抱有各种怀疑、不满”，对军队的制度、生活、待遇不满等事件逐渐增加，因而导致了日军士官不断发生反正投降事件。日军首脑机关认为，“投敌者原因是厌恶军队生活，害怕私刑或怕暴露罪行，或相信中共方面的优待俘虏的宣传，以及考虑到被俘后再归队要受到严厉处罚等等。但也有一部分士官是从前信仰共产主义而逃走的”。他们竭力回避叛逃的原因是推行侵略战争，不得人心的实质。

第二十六师团调走时，该师团长佐伯文郎中将对管区治安状况，特别对包头因兵力减少后，以及南部八路军势力的扩大，极为关注。在其《手记》中提到：“关于包头方面的警备，对于傅作义军在占领区的活动，务期及时集中兵力，彻底予以粉碎性打击。对包头地区要严加戒备。”他要包头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稻森利助中佐，收集五原、宁夏方面的情报，并指导绥西联军、东

亚同盟军进行情报谋略活动，指示其与驻在五原的傅作义暗中往来，为的是防止傅作义对包头地区的反攻，相机进行怀柔工作。

年底，第一一八师团和独立第二混成旅团又组编为第四独立警备队，司令官为坂本吉太郎少将，所辖第十九、二十四，共六个大队，装备差，人员不足，担任蒙绥地区的防务。

1945年期间

到1945年，驻蒙军每况愈下，敌参谋次长视察时说：“驻蒙军对苏作战准备无所作为，管区治安恶劣”。傅作义以优势兵力对日军占领区采取包围，我抗日武装力量显著壮大，从山西偏关北上，进入蒙绥地区，不断破坏铁路，切断日军运输命脉，围歼据点，策动伪军反正。

8月13日，苏蒙联合红军部队，从张北—库伦大道南下，傅作义军队抢先收复张家口。1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及华北方面军指示驻蒙军“停止战斗行动，适当进行局部停战谈判”。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战，使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终于遭到可耻的失败。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绥西包头地区除正面敌人口军以外，还有各种形式的伪军，作为日军外围掩护部队，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伪蒙古军、杂牌军很多。关于种类庞杂的各种伪军，仅将有代表性的概述如下。

二、关于蒙古军建立的情况

（一）蒙古军建立分为三个时期。

（1）1936年2月，伪蒙古军政府成立，正式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由德穆楚克栋鲁普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下设军务部、政务部和秘书处等机构。下辖两个军，共九个师，第一

军由李守信兼军长，第二军由德王兼军长，由日本人组成顾问部，监督指导司令部各项工作。

(2) 1936年10月，蒙古军在德化特务机关机关长田中隆吉(后任陆军省军务局长、兵务局长)亲自驱使下，和王英统率的“大汉义军”，进犯绥东傅作义驻区。傅作义所部在百灵庙战役中狠狠打击了日寇和伪军嚣张气焰。

为了简化指挥层次，取消了军的建制，由司令部直辖各师。

(3) 1937年12月，日寇占领归绥、包头以后，蒙古军司令部迁至归绥市。任命李守信为总司令，主要协同日寇驻守在绥西地区的日军警备区的外围旗县地带。

1942年期间，日寇为削弱李守信实力，以蒙古军各师一律蒙古化为由，将原蒙古军中由汉人编成的第一、二、三师，改变为靖安警备军，由丁其昌任司令。

1945年，日寇再度改编蒙古军，由于司令部设在厚和浩特，张家口蒙疆政府设立军事联络部，4月份升格为军事部，撤销治安部，由军事部统辖军事、警察两大系统。由李守信兼任部长。将汉族地区的警察队改编成蒙古军，已构成担负蒙疆治安防务任务，有代替日军兵力减少后，监视国境，收集情报，并负有对苏蒙红军作战的使命。

蒙古军在日本统治时期，助纣为虐，残暴镇压蒙、汉各族人民，配合日军对国民党军队和我抗日武装进行扫荡、围剿，充当日寇得力帮凶，有罪于国人。

日寇为了控制蒙古军，成立了日本顾问部，对蒙古军起到指挥、监督、控制作用，实为“太上皇”，包括李守信在内的高级将领都唯命是从，按日本顾问意图行事。1938年至1940年期间，顾问部最高顾问为高场损藏大佐。1940年以后，由绥远日本特务机关长小仓达次少将兼任。配有顾问、教官多人，为蒙古军一切军

务实权的操纵者。顾问部统辖各师的顾问分室。

蒙古军顾问部开始在包头设行营司令部，由贺喜格中校负责。1938年秋，撤销行营司令部改为顾问分室。地址先设在包头旧城东门大街关帝庙西院（二完小院内），后迁到大陆饭店。

（二）顾问分室的活动情况：

（1）利用蒙古军驻防地区（四师驻大树湾、六师驻固阳、八师驻百灵庙）和森盖林庆部驻伊盟的条件，开展武装侦察，了解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抗日武装的活动。派出情报人员，化装成各种身份，收集傅作义、马占山、马鸿逵、马步芳驻地和我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情报。另外伊盟的阿王、达拉特旗的康王也都是情报的重点搜集对象。收集到的情报分别呈报顾问部、包头日本陆军特务机关。并与日本包头宪兵分队、领事分馆、绥西自治联军、东亚同盟军等组织的特务部门密切协作，交流各种情报。

（2）通过顾问、教官、指导员监督、控制蒙古军各级官兵的政治、思想动态；负责管教、培训、调遣防地、物资武器弹药的供应；指挥各部队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曾在伊盟、乌盟、巴盟、晋北、绥南、大青山等地，与我抗日武装和国民党作战多次。

（3）协助地方日本特务机关、日本宪兵队、警察机关镇压抗日爱国活动，屠杀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和爱国人士、国民党的谍报人员。据蒙古军包头宪兵中队队长傅荣久（傅治国）供认，仅他一人受日本顾问的指使捕杀过爱国人士、特工、战俘就有九人之多。

（三）顾问分室人员情况：

1938年秋至1940年期间，主任为贺喜格中校；

顾问：中野兰哥尉补，系顾问部委派，负责指挥驻包头地区